

湖南文艺出版社



都市风帆

DUSHIFENGFAN

都市风帆

——株洲市新时期小说散文选

株洲市文联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都市风帆

——株洲市新时期小说散文选

株洲市文联编

责任编辑:龚湘海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株化集团公司科发印刷厂印刷

※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字数:242000

简易精装: ISBN7—5404—1650—5
I·1315 定价:11.8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株洲市清水塘 邮编:412005)

目 录

小 说 卷

我们建国巷·····	叶之蓁	5
玉镯失落·····	田章夫	19
人生偶拾(十八题)·····	姚天元	27
棋殇·····	聂鑫森	43
小动物奏鸣曲(三题)·····	易介南	57
皮包里的月亮·····	黄 勇	72
迟到半点钟·····	刘 维	78
伤感的桃林·····	万 宁	91
潜伏·····	曾 海	102
野猪岭的早晨·····	李永森	113
津县的骄傲·····	梁水根	124
漩涡·····	王友生	132
码头·····	夏汉泉	150
正果·····	周军军	159
爱情辩证法·····	吴荣福	164
眼睛·····	胡厚春	172
在红军师长的墓地上·····	易振荒	182

殷红的血和玉质的心·····	曹光辉	194
----------------	-----	-----

散 文 卷

野刺莲(外一章)·····	郑 玲	209
域外三记·····	李金波	220
大别山行吟·····	刘 强	229
战地黄花分外香		
——记谭震林与蒋秀仙的婚恋·····	陈利明	235
洞庭雀·····	康铁山	243
月夜荡舟·····	赵延荣	246
胜似乡愁(外三章)·····	罗子英	249
闪闪萤火虫·····	曾湘文	258
情谊源自一部书		
——记毛泽东和他的老师胡汝霖·····	胡君履	261
寻芳恨晚皮佳洞·····	曹敬庄	269
听我唱支辣椒歌(外三章)·····	黎福青	274
长长的风景线(外一章)·····	程 政	281
冬的眼睛(外一章)·····	寻 坚	287
渔仙·····	陈仕斌	292
父亲·····	桂新华	294
竹·····	蒋非非	297
散文三题·····	刘 静	299
冬天的故事(外二章)·····	秦 华	304
走过大酒店(外二章)·····	刘润清	308
长沙,你给我留下长长的思念·····	易建国	313

《都市风帆》序

田章夫

一座城市,如果没有文学,没有艺术,那一定是一座浅薄的、庸俗的、麻木的、乏味的城市。

值得高兴的是株洲市不是这样一座城。我们的城不但经济发达,交通便利,而且文学艺术有如闪烁在楼群上的阳光和穿城而过的江流,渗透于生活之中,以耀眼的光波和玻璃似的声响温暖、滋润、愉悦人们的身心。

现在,当我们将这本《都市风帆》呈献在各位的面前,有一种喜悦感在心中潮水般涌起。我们的心灵充满喜悦,不只是因为这本约24万字的小说散文集,编入了我市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之精华,这些作品当然不能说是篇篇锦绣、字字珠玑,但其品味确实不俗。这一点,人们只须读一读以《我们建国巷》为代表作的小说和以《野刺莲》为代表作的散文,自会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感受。读者或许会看到,穿过都市的强劲的风,虽然卷起些许灰尘,但城廓上的彩旗神采飞扬,那是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的写真!同时,一张理想的风帆也在人们的心头昂然升起!

我们的心胸为喜悦所充实,主要在于株洲市已经拥有一支以几位国家级作家和诗人为代表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日趋成熟的创作队伍。他们风格不一,追求各异,从而创造了整体的丰富。他们敏锐的目光在变革时代缤纷的生活场景中捕捉到最典型最光彩的东西,他们的笔饱蘸激情,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人们的喜怒哀乐。并向深层挖掘,造就了自身的深度和高度。

都市的风帆已经升起,让我们乘风破浪,奔向彼岸的辉煌。

小说卷

我们建国巷

叶之蓁

建国巷，南方一条古老而质朴的麻石小巷。它被日益膨胀起来的新市区那色调和谐、式样新颖的高大建筑物夹持着、压迫着。然而，它并没有被吞食。它清高地、顽强地楔在现代化建筑群中，像一条幽深而贫瘠的峡谷。

从什么时候起，它就出现在我们城市的版图上了？谁也不清楚。

它那落满市尘的瓦屋顶上长着一丛丛衰草；路面的麻石被鞋打磨成了龟背形。那被风雨剥蚀得像千层糕一样的古城墙上散布着大大小小的砖洞，据说是闹日本鬼子那年，被飞机轰炸扫射的，如今成了麻雀的“安乐窝”。关于建国巷的历史，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小时候，我隔壁的胡伯曾指着巷口一堵深灰色的墙告诉我们：闹“长毛”那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那时节（他这样解释），城里驻过石达开的兵马，在墙上贴过“均贫富”的告示。城里没跑的人都意外地发过一次“露水财”。胡伯甚至还有根有叶地说，布告就贴在从地面数起的第五十块砖上。

五十块砖，天，谁够得上？小把戏们喜欢赌狠，大家抓着黄泥

巴跳起脚往墙上拍。叠罗汉，踩凳子，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墙上印满了小“瓜子”印，但谁也没够上第五十块砖。

“你们细人子怎么够得上？人家是骑在马上贴的。”胡伯这样说，“高架子大洋马，见过吗？”

“长毛”，太平天国，大洋马……唉，尽些老时候的事，历史书上的事，谁又见过呢？还不是哪个嘴巴硬就听哪个的！

我的祖父生在这巷子里，我父亲生在这巷子里，我生在这巷子里，我的儿子刚刚还是生在这巷子里。我熟悉它的呼吸和心跳。

夏日的傍晚，当落日的余晖淡淡地涂在那高高的古城墙头时，巷里便传出哗哗的泼水声和竹制家具在凸凹不平的麻石地面上拖动的噼里啪啦的声音。巷筒里氤氲着一股潮热的水气。各家的桌椅板凳都拖出来了，于是，响起了筷子碰饭碗的叮当声，邻里间粗野而亲切的招呼声。

“喂，过来喝一杯吧。真是，酒也舍不得买，留着讨后婆婆？你这个老骚公！”

“三伢子，来吃肉，一块大的。给我做崽算了，餐餐有肉吃。”

女人们是固定的，在各自的饭桌前招呼小把戏进餐；男人们大都是流动的，端着碗，挨桌走动。木制的拖板鞋敲得麻石地面得得响——啊，建国巷夏日里热闹的晚餐。

入夜，各家的桌椅板凳收进去了。巷子里又横七竖八地摆满了躺椅、竹床。昏暗的路灯下，到处躺着人。锯屑拌“六六六”粉制成的土蚊烟散发着呛鼻的气味。“噗哒噗哒”的葵扇一直要响到天亮……

冬天呢，冬天每家的堂屋里都有一炉火。大人们互相串门，围着火炉喝茶、抽烟、“翻古”。他们经常为一个几千几百年前的、谁也没见过的掌故争得颈根上暴青筋，好像那些古人是自己的什么亲戚似的。直到夜深了，巷子里传来一阵“卖饺耳哟，卖饺耳哟”的苍老的声音，大家才打着哈欠，伸着懒腰走了。

卖饺耳的老信总是这个时候来，穿着一件打补丁的青棉袄，担着火炉和装面皮、肉馅的小柜子，柜子上吊着一盏晃晃悠悠的三角形风灯。他的布底鞋是那样坚硬，敲在麻石地面上，清脆、响亮，从空荡荡的巷子的这头一直响到那头。

他的吆喝声特别好听，他煮的饺耳也实在好吃……

啊啊，建国巷，这条仅仅只有几尺宽的小巷。那时，确是我们这群小把戏的天堂和乐园！

我们喜欢玩“抓特务”，“打游击”，吆喝着、尖叫着，在巷子里穿进涌出，真痛快！

当然，这一切也不都是随心所欲的。我们“第三世界”的“军事行动”经常会受到“超级大国”的干涉。闹过了头的时候，胡伯就会拿着一柄竹扫把，从门口跳出来，恶声恶气地骂我们，赶我们。（他那时还没退休，在工厂里经常上夜班。）

于是，我们的“军队”全线溃散了，腿长的窜出巷口，落荒而逃；腿短的攀着墙边的电线杆，爬到房顶上——杀气腾腾的竹扫把够不着的地方，对着胡伯作鬼脸。

每到这种时候，我家对门的王大福就会双手叉腰仰起脑壳，鼓着眼睛训斥我们：“你们这班小杂种，就是不学好！下不下来？娘的，看我不把你们送到派出所去关黑屋！”他经常拿派出所来吓我们，好像派出所长是他的亲姐夫一样。其实，他自己到派出所去上户口，还要拖我父亲陪着呢。他那时刚从乡下来，在皮件厂混事。脸又黄又瘦，留着个“半边瓦”的西式头。他只能在我们小把戏面前逞角色。

胡伯不这样，只要我们一上房，他就吓得先丢了扫把，可怜巴巴地呼吁和谈：“哎哟，我的小祖宗！你们下来好不好？下来下来，听话，胡伯给你们分酸菜吃。真的！”胡伯家的酸菜出名的好吃。他家的堂屋里有一只半人高的酸水坛子，里面的酸水养了几十年了，泡出的酸菜又酸又甜。那味道，哎呀，啧啧！

分酸菜的时候，胡伯总是先叫我们按高矮排好队，然后，从屋里端出一大碗酸菹头或酸萝卜之类的东西。我们这时都变规矩了，不吵不闹，齐刷刷地伸出一排黑糊糊的小手。胡伯分东西从来都是认真的、公平的。他从矮的这头分过去，又从高的那头分过来，嘴里不住叨念着“谁也不多，谁也不少，拿住，拿住。”要是分少了几个，他决不马虎，一定要回堂屋里拿来补上的。胡伯看着我们吃。我们也边吃边互相监视着，不许谁把酸菜悄悄地塞进小口袋里，等大家吃完了又拿出来馋人。这是在胡伯门前吃酸菜的规矩……

这些小时候的事，现在想起来，仍那样有声有色，就像发生在昨天。人生过得真快！转眼间，大跃进、苦日子、四清、史无前例的“革命”，小学、中学、大学、进厂当技术员，人，已到了中年。

现在，我仍住在建国巷——我那当皮匠的父亲留给我的那间竹编墙的小屋里。我在不知不觉中顶替了父亲的位置，放了学就拿着纸手枪在巷子里“冲锋”，建国巷仍然是那样的古朴、破旧。更新万物的时代几乎没能在它身上留下什么痕迹，只是人，已经“改朝换代”了。

胡伯仍住在我隔壁，已经退休十几年了。他的背深深地佝偻着，除了堂屋里的酸水坛子和肩膀上锃亮的光头依旧外，他变了；不但变成了一个十足的老馆子，而且，由于满女找了区武装部的一个排级干部，使他变成了建国巷的“社会名流”。他常常以各种方式炫耀他的“乘龙快婿”和自己的军属地位。有一年春节前夕，他提回了一斤墨鱼干。这在当时简直是使人眼睛发亮的珍品！碰着的都问他的哪里买的。他告诉大家，就在前面商店，要买的快去。于是，巷子里一声吆喝，大家纷纷提着篮子去了。没多久，巷民们扫兴而归，原来，胡伯跟大家开了一个伤心的玩笑。商店里的墨鱼干的确有，但要凭军属证供应。大家抱怨胡伯。老馆子不还口，只是嘿嘿地笑。他从邻居的抱怨声中得到了某种满足。

事实上，胡伯的墨鱼干并没有留到过年，当晚炖了一锅墨鱼红枣肉，拖着大家吃。他说：“有福同享，大家去试试味，其实这样搞特殊也不好，我郎他们部队上都这样讲过。”结果，一斤墨鱼干，他自己也并没比人家多吃两筷子，还贴了油盐。胡伯是个开通人。

住我对门的王大福也变了，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城里人，而且，是一个上等城里人。他新近还发了福，腆着个肚子，一副首长的派头。事实上，他的确也当了我们建国巷的最高行政长官——居民小组长。他还有个嗜好，喜欢人家叫他的“官衔”。胡伯好盘人家的“宝”，在一次居民会上，故意拿王大福开心，说：“组长算个什么官！我外孙妹子考进学堂就当了一个么子委员哩。伪政府那阵，我们这里就属一个保，管事的叫保长。叫你保长不更威风吗？”大家都笑了。王大福却很认真，扳着指头数：“十户一甲，十甲一保，百把户的场合，是差不多哩。”他完全认可了。从此，大家都开始叫他“保长”，不再叫他的名姓了。

遗憾的是，“保长”只是兼职的。他的正式工作是皮件厂熟练工，而且干得很不得意，要不是1977年底工资调整调了一级，现在还是个二级工哩。他从不愿意向人提起厂里的那本经。不过话又得说回来，他干“保长”却是称职的。他虽然有时爱甩几句“官腔”，不看场合地作些“越南派几万枪兵到东不寨抢谷米”之类的形势报告，但为大家办事贴心，尤其是“本巷观念”强，从不肯让他的“臣民”们吃亏，颇受大家拥戴。

“文化革命”中，我就得过“保长”的好处。当时，我在单位受冲击，天天挨斗。原因有二：一是不该多读了两句书，知识越多越反动嘛；二是不该遗传了我那皮匠父亲的犟脾气，撞墙不转弯，和他们硬顶。一回，“保长”对我说：“你家里那本账我清楚，不会有什么问题。你不要去工厂了，在家里住着，有我掌本！”我说：“不去，他们会来抓。”他说：“敢！搞到我们建国巷来了，打脱他的脚哩！”我听了他的话，果真不去工厂了。几天后，厂里派人来抓，被“保长”

和全巷的人团团围住，“保长”向他们要逮捕证（真新鲜，那时候抓人还要这种东西！），对方当然没有。“保长”一本正经地说：“没有就不准抓人，我是这里管事的，大小也是一级领导。在建国巷办事没有我点头不行！”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对方人少，不敢行蛮，只好算了。“保长”是好人。我们建国巷的人都是好人。

除了上大学的四年外，我一直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构成了我全部生活的背景和环境。这种环境是恬静融洽、充满温暖和使人羡慕的。在这里住着，上班去了，小孩有人看，衣服有人收，来了客有人招呼，生了病有人送单方。这里没有阴谋，没有仇视，没有贪婪，没有猜忌，没有利害冲突，也没有生存竞争。大家生活得艰苦，但也生活得和睦，生活得愉快。

啊，建国巷，我心中的乐土！假如后来不是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至今仍使我大惑不解的事情的话，我完全有可能像父辈们一样，在这里甜蜜蜜地生活到我辞世的那一天。

其实，那本是件好事。我得了五百块钱的技术革新奖，买了一台十二吋国产电视机。我万万没想到，这台亮闪闪的、又能唱歌又能“放电影”的、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木匣子，竟会像阿拉伯神话中那只装着魔鬼的胆瓶一样，给我带来痛苦和烦恼。

当时，在我们建国巷，电视机的确还是件稀罕物。那天晚上，巷里凡是在家的成员几乎都来了，把我家里里外外塞了个水泄不通。我虽不抽烟，为了图个痛快，买了半条过滤嘴香烟来招待大家。

每逢这样的场合，“保长”照例是主事的。他满头大汗地吆喝着，维持秩序；让坐矮凳的挪到前面来，让坐高凳的搬到后面去。最后，把闹成一堆的小把戏们一个个抓住，脱掉鞋子，通通扔到我那铺着白床单的床上。

那晚的电视节目是什么？不知道。我和我爱人没法坐下来，整整一晚，都在人缝中艰难地跋涉着，忙着给客人递烟端茶。其

实,大家都没有认真看,几个新闻简报加一部老掉牙的故事片,有什么味!再说,电视机的质量也真成问题,图像一扯一扯的,三分分钟内竟翻了二三十个“跟头”,弄得人眼晕。热心的“观众”们除了图个“在屋里看电影”的新奇感以外,主要还是来赶热闹场合的。从电视节目开始起,大家的注意力就不在眼睛上,而在嘴巴和耳朵上——扯谈。围在一起扯谈,是我们建国巷巷民们的传统爱好。

大家从自由市场的开放扯到工厂的计件工资,又从计件工资扯到电视机的价格。“保长”对我说:“娘的,真贵!好在你发了次露水财,不在乎这几个钱。”背后,有人问我这次到底得了几多钱。我老实地回答了。黑暗中有人道:“嘿!当我一年的薪水!”“保长”斜叼着烟,一拍我肩膀,说:“喂,什么事工价这样高?就是你晚上没事的时候,用铅笔在纸上涂几下?娘的,五百块,真是赚钱的不费力,费力的不赚钱!”

天!在纸上涂几下?看他说得几多轻巧!为了这项革新,我整整伤了二十年脑筋。这项革新,每月能为工厂节约十几万。他们不能理解我的劳动,我也无法向他们解释,只好苦笑了。

于是,我成了大家谈论的中心。老辈子扯起了我小时候的一些“可以看得出出息”的事;同辈人开始热心地替我算账;再这样赚下去,一年要收入好多钱;小把戏们关心的则是五百块能买几多装上电池可以转着圈跑的“自动翻斗车”。

我不喜欢人家这样注意我。胡伯不喜欢人家不注意他。自从他当了“军属”以来,每次扯谈他都是理所当然地处于中心地位。这次,他竟被“舆论界”冷落了。他感到了愤懑和委屈。终于,他坐不住了,站起来,用青筋鼓鼓的巴掌拍电视机的壳子。他拍一下,本来就不稳定的图像又应声翻一个“跟头”。

“这号质量,哼!”他不屑地说,“只怕是文化革命搞武斗那几年出的。”他家那台一波段半导体收音机就是“文革牌”,不使劲拍它几下,是绝不肯唱歌的。

“算了吧，胡伯，有本事你去买台好的来。”黑暗中，有人赌他。

“是要买的。”胡伯口气里有几分炫耀，“跟我郎讲一声，叫他托人到上海去买。”

“保长”在一旁笑着说：“这号事，只怕你郎当市长也办不到。没有四百块钱扳在玻璃柜上，营业员肯把电视机给你？四百，有吗？扳出来看看呀！”

大家都笑了。

这是胡伯有史以来第一次当众受到奚落。他慢慢地从电视机上收回手，缩到一旁，不再言语了。他的脸色一定很难看。

“抽烟抽烟！”隔不多久，“保长”就这样喊一次。他嫌我敬烟敬得不勤，干脆自己动手开烟，见人头就丢一支。等到电视节目完了，这半条烟也就丢完了。他耳朵上一边夹着一支烟，问我道：“主家，还有烟？”我看看桌上摆着的五只空烟盒，只好尴尬地笑了。

“越有钱的越小器，”“保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娘的，五百块！留着不怕长霉？喂，胡老倌，你是二财主，下次该你请客……”

没有回答。胡伯的椅子空着。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

那次以后，“保长”到我家串门的方式有了些改变，他有个端着茶杯串门的习惯，但一进我家的门，总是把手中的茶水泼掉，说：“泡杯好茶喝喝看。你家的茶叶至少是七、八块钱一斤的！”要不，就从桌上抓过那包待客的香烟，抽出一支叼上，对着火后，把自己手中的半截烟在椅子腿上揷熄，夹到耳朵上去，说：“过过高级瘾看。到底是赚大钱的，烟也高级些！”我并不是个小机器人，“保长”这些酸溜溜的话实在叫人不快。

更使我莫名其妙的是胡伯，天晓得他怎么突然就不理我了！有次我叫他，他鼻子里哼一声，头歪到一边去了。其实，我们两家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他那只酸水坛子里的酸菜，我从小吃到现在。隔几天给我家送一碗酸菜，已成了胡伯多年的习惯。现在，他